

两大战略下构建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格局的思考和建议^{*1}

——以四川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张鸣鸣

【摘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是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面临新的挑战背景下的重大长期性、战略性举措。作为农业大省和农民工大省，四川如果能够有效利用当前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发展阶段差异，形成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梯度推进态势，使其成为有序传递带动和支撑城乡发展的接力棒，能够成为四川城乡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四川具有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的良好基础，并已初具发展态势，但还存在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应将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置于新时代的宏观背景下统筹考虑，形成提质和增收为导向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局面，培育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的主力军和后备军，建设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格局。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 劳动力接力发展 农民工返乡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19)—04—0103(07)

【作者】张鸣鸣 研究员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研究所 四川成都 610072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进入到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在城镇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交织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质上是要通过这一项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部署调整城乡发展利益格局，进而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梦。其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农业长远发展嵌入于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强调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二是将乡村长远发展寓于城乡融合大格局中，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三是将小农户长远发展置于现代产业基础之上，注重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从这三个特征出发，如果能够有效利用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发展阶段差异，形成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梯度推进态势，使其成为有序传递带动和支撑城乡发展的接力棒，就有可能实现我国城乡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学术界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较多，整体上对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关注度更高，谢桂华⁽¹⁾根据户籍性质与流动状态，将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所有劳动力分为四组，研究发现，外来工人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最高，之后依次为本地工人、本地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研究还发现，外来农民工的流动与职业的非农转换使得他们在流动前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无法得到完全的转换。近年来，农民工返乡逐渐进入学界研究视野。事实上，移民反向流动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研究显示全世界移民中约有三分之一返回家乡(Murphy, 1999)，⁽²⁾ Stark(1996)⁽³⁾研究发现回乡的原因包括在移民输入地难以找到合适工作、回乡的人力资本或财务资本回报率较高、回乡的生活成本较低等，其中因投资回报率高而返乡的影响显著于其他两项。国内学者对农民工返乡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返乡农民工的特征和影响因素，总体看来，受教育水平越高、⁽⁴⁾流出地非农产业越发达、年龄偏大且受教育程度偏低(Liang and Wu, 2003)、家庭需要程度越高(Giles and Mu, 2007)等情况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返乡。二是农民工返乡对劳动力输出地发展的影响。王彩平(2013)认为农民工“返乡潮”对劳务输出地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存在负面影响，相对应的观点是，农

^{*1}本文系四川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汶川地震十周年：汶川灾区农民价值观的嬗变及引导策略”(编号：2019JDR02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的带动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增加农民工收入、促进农村地区脱贫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⁵⁾三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及原因分析。石智雷等(2014)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的家庭经济状况、文化程度、个人信仰和生产积极性等对创业行为有显著影响;朱红根等(2012)社会资本、服务环境、企业家能力等对创业绩效有直接影响;庄晋财等⁽⁶⁾研究发现,知识资源和运营资源的获取对农民工创业的运营管理能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运营资源的作用大于知识资源。农民工创业能力(黄振华, 2011)、本地强连带关系(黄洁, 2010)、社会网络规模与质量(黄晓勇等, 2012)等因素会直接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

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作为城乡劳动力流动和转移主体,因其历史贡献突出、覆盖面广、数量庞大以及存续时间长等特点,农民工流向和影响因素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受到广泛关注。国外相关研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劳动力双向流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从多个层面讨论了“进城”务工人员“返乡”的现象、影响因素等问题,但无论是已有研究还是实践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基于自身基础和环境条件做出的自我选择使其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具有双向性。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8.52%,与工业化水平和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相比,均有较大差距,劳动力持续地、规模化地向城镇流动依然是中长期的主要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下,城乡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外部条件发生深刻变化,无论是从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要求而言,还是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动力出发,抑或是从劳动力提升发展能力的自我需求考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的新型劳动力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中国西部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四川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与前一时期显著不同,当前四川农业农村发展需立足三大背景:一是城镇化背景。2017年四川省城镇化率达到50.4%,过半的城镇人口规模和长期的高速增长表明四川已经进入以城镇为主要载体的发展阶段,乡村与城镇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二是全球化背景。“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在“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下,四川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全球化发展格局中,农业农村的对外交流与沟通不断增强,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影响。三是工业化和信息化背景。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高速发展的阶段,四川以健全的产业门类、丰富的资源要素禀赋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技术经验,已经成为中国西部最具发展潜力的省份之一,受益于此,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工业化已经呈现出巨大的发展空间。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观察,四川外出务工劳动力规模已经保持连续40年的增长,2017年达到2505万人,近年来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从2012年开始,省内务工农民工数量首次超过省外,到2017年二者之差达到151万人。二是因就业创业主动选择返乡的劳动力数量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四川的发展阶段和劳动力流动态势具有典型代表性,梳理其变化的基础、潜力和趋势,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潜在风险,在此基础上提出两大战略下构建新型城乡劳动力流动格局的思考和建议,在更广范围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前瞻价值。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和农民工返乡的实践

1984年中央1号文件和4号文件^①的连续出台,开启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门,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间,数以亿计的农民向城市流动,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首先,农民工是低成本快速工业化的重要力量。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为1.49亿人,占全部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67.8%;而制造业和建筑业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分别为3233元和3687元,仅是这两个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七成左右。如果考虑到在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低参与率,近年来农民工每年为降低工业化成本所做的经济贡献至少是数万亿元级别。而根据学者测算,^②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十多年间,农民工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这成为我国加入WTO以后工业化超常规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二,农民工为低成本大规模城镇化做出巨大贡献。1978年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7.9%增长为58.5%,连续40年保持了每年平均增加1个百分点、1600余万城镇人口的世界奇迹,而且成功地避免了拉美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超前城镇化的困境,其原因正是因为占城市居民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在为城市服务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的同时,以最少占用节约了大量的城市资源。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为19.8平方米,不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的一半,只有少数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享受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其社会活动比较单一,对城市公共空间需求较小。第三,农民工是低成本自主型乡村建设的关键性推动力量。二元户籍制度下的人户分离的流动方式,不仅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还形成了独特的乡村建设推动力。改革开放40年来,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78%,根

据新口径,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经营净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务工毫无疑问是农民增收的最大推手,也是农村大面积减贫脱贫的重要源泉。正是在这40年间,农村房屋建设投资年年攀升,农户居住和生活条件大幅改善,减少的劳动力同时缓解了尖锐的人地矛盾,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组织化和设施化水平持续提高。

伴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日趋融合,市场理念深入人心,出现了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新态势,并引起中央和各地市的高度重视。2015年国办发47号文件《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及其后一系列支持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农民工返乡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民生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和谐稳定新动能”。2013年,阿里集团发布了20个淘宝村,到2017年淘宝村和淘宝镇的数量已经分别达到2118个和242个,分布在东中西部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带动直接就业机会超过130万个,年轻网商(30岁及30岁以下年龄)占比达51.8%。^②2014年河南省人社厅组建成立河南云工社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在全省18个地市及108个县设立工作站,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手段,创新农民工服务模式,截至2018年8月全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达112万余人。在“雁归兴毕”行动引领下,毕节市通过组织各县(区)前往福建、宁波、深圳等地召开座谈会,春节前后定期开展“春暖乌蒙”等返乡就业服务,到2018年5月底,累计返乡创业人数达到15.59万人。

整体上看,在当前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及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支持政策,正在进一步拓宽农村劳动力对流动方向的选择,原先因劳动能力或年龄等因素被动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返乡,已经呈现出劳动力主动在两个就业市场进行自主选择的发展态势。

三、四川城乡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进展

1. 四川城乡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政策演变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离土不离乡、就地进工厂”,到20世纪90年代“离土又离乡、进城进工厂”,再到新世纪以来“新型劳动大军和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21世纪初开始的“燕归来”,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城乡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始终是四川的政策关切和社会聚焦点。1988年金堂县竹篙镇50名女工到广东省东莞市厚兴皮具厂务工,开启了四川农民工组织化、品牌化输出的大门;2004年四川实施“千万农民工培训工程”,提高外出劳动力素质,大幅增加农民工收入;2013年四川在全国率先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内,打破了农民工转移市民化过程中最为坚硬的壁垒;2015年《关于支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并设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有力支撑;2018年印发《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十六条措施》,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为指引,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和人性化关心关爱。

基于资源和人口条件以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四川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相关政策主要经历了三次较为显著的变化: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为导向,各级政府拓宽正规就业渠道、允许农民进城办厂开店等方式对农民工提供支持,1995年1月首趟大篷车农民工专列由成都开往广州,迎接“川军”返乡。第二个阶段是本世纪初到2014年左右,以提升农民工劳动技能和保护务工权益为导向,四川推动劳务品牌建设,加强技能培训,使劳务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第三个阶段是2015年以来,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代,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壁垒进一步打破,“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和战略落地,四川继续加大农民工服务支持力度,尤其注重破解农民工进城落户等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引导部分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使外出务工劳动力双向选择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

^①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在试点地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4年中共中央4号文件《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中提出,“一亿以上的劳力只能向农村(包括集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以及家庭工副业寻求出路”。

^②根据卢锋(2012)年测算,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农民工名义货币工资长期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速约为9.7%。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显著增长,随后十年来相对停滞,晚近十多年增长较快,与正式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比率大致经历“前高后低”走势。从实际工资来看,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除去少数年份如1992~1993年实际工资有明显增长外,整体来讲,似乎没有增长。

^③阿里研究院,淘宝村:乡村振兴的先行者——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7年),中商情报网,2017-12-13。

2. 四川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的基础和潜力

在中国改革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符合刘易斯理论中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类型,通过消除限制经济增长的障碍,中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极高的增长潜力,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速度。⁽⁷⁾四十年的持续深化改革实际上是逐步打破劳动力流动和迁徙障碍的过程,使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受发展阶段、基础条件、制度环境以及劳动力自身素质等约束,劳动力过早退出就业市场、城乡两个就业市场激烈竞争、劳动力短缺与过剩同时存在等问题日趋凸显,是两个层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老龄化替代人口红利成为人口过渡的主要趋势,劳动力资源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区域间、城乡间、部门间和用人单位之间关系的走向日趋复杂,劳动力配置需求产生新的变化。这使得打破劳动力市场的非良性竞争、满足不同就业市场的差异化需求成为可能,典型的,那类初次进入异地城市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例如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民工,更易于接受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或建筑业的工作条件,而二代农民工则更重视个体长远的发展性而很难将经济收入视为单一指标。劳动力资源阶段性的差异和就业市场需求的差异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表现更为显著,这使得二者在实现劳动力资源接力发展具有可能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四川城乡劳动力发展阶段不同,退出城市就业市场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典型特征,使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具有可能性。作为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四川省即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2017年达到2505万人。近年来,每年有超过百万农民工返乡,其中部分农民工跟随沿海地区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返乡就业创业,更多的则是因年龄或家庭因素退出城市就业市场而返乡的农民工,根据我们在广安、资阳、成都等地调研的情况看,已婚女性和40~55岁男性构成了后者的主体。根据另一份研究,⁽⁸⁾近年来农民工返乡规模不断扩大,样本村2016年的返乡率达到17.5%,返乡农民工年龄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上,更多的是一种被动选择,且近三分之一的返乡农民工处于没有工作的赋闲状态。二是发展基础和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四川乡村劳动力面临较大缺口,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的潜力巨大。根据四川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2016年全省2429.13万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85.4%的年龄在36岁及以上,其中超过55岁的达到924.44万人。与此同时,耕地规模化耕种面积仅占全部实际耕种的耕地面积的9.2%,规模农业经营户仅有53.19万人,其中女性和年龄在36~54岁之间的经营人员分别占50.6%和56.6%。同时,脱贫攻坚、幸福美丽乡村等重大项目的实施,使四川农村交通等基础设施大幅改善,全省99.3%的村通公路,加上四川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形地貌,发展规模化、多样化的现代农业空间广阔。

3. 四川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的趋势判断

在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方面,近年来四川已经呈现出了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归雁经济”的感召下,截至2018年11月底,全省累计有65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创办企业16万户,带动就业200余万人,实现总产值3796.5亿元。调查显示,⁽⁹⁾返乡创业人员中36~55岁人员占比达到70.3%,另有25.2%的为25~35岁农民工。这部分群体文化素质总体高于全省农民工平均水平,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达到64.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省返乡创业从事种养业占62.2%,其中绝大多数为以规模化、机械化、组织化为标准的现代农业产业,成为带动农业增效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努力,尤其是近年来在脱贫攻坚上的巨大投入,四川城乡基础设施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6820公里,铁路运营里程4919公里,水利设施投资位居全国前列,率先建成“全光网省”,建成幸福美丽新村2.1万个,2200多万农村人口受益,为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特别是农民工返乡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美丽家园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当前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1. 地方上对两大战略下城乡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缺乏系统性、综合性和长远性考量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是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面临新的挑战背景下的重大长期性、战略性举措,两大战略的共同指向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本质在于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从调查情况看,地方政府对推动两大战略高度重视,机遇意识和紧迫感十分突出,但在部分地方出现了认识偏差,导致在推进过程中一些行政化、政绩化等问题的出现,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国内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增大的宏观背景下,农民工返乡数量增加、时间提前,一些地方出于体制惯性或增收维稳的考虑,忽视现实约束和农民工自身基础,广泛动员农民工创业,当前已经在部分地

区出现“谁回乡谁后悔”的预言,如果农民工因行政动员而参与到投资大、风险高的领域,未来一旦创业失败,不仅是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还可能诱发农村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少数地方在脱贫攻坚和农民增收的压力下,动用大量行政资源推动本地劳动力外出打工,又缺乏对这些年轻劳动力的引导性培训,导致部分外出务工人员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和非农就业市场,既不利于劳务输入地的社会稳定,也对务工人员本人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2. 城乡劳动力逆向流动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近年来,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呈现出巨大的生机和发展潜力,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吸引着大量城市社会资本以及城乡劳动力转而从农村和农业寻求投资回报。然而,一些创业者对农业经营的复杂性、现代性和高风险性的认识不足,以工业或传统农业发展的眼光和思路去投资现代农业,缺乏明晰的发展思路和目的,对当地的资源禀赋和环境条件未形成客观准确的评估,同时对投资农业和农村建设抱以过高期望,在项目创始之初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3. 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面临非市场因素障碍

一方面,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退出、承包地“三权”分置以及农村财产权抵押融资等面临法律障碍,既难以形成进城农民工家庭的有效财富积累,也难以对返乡创业农民工实施长期、有力的保护,使城市资本面临不稳定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城市对农民工市民化还存在户籍、子女教育、职业壁垒等诸多障碍,导致农民工长期保持流动状态,其作为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作为城市新居民的社会融入和政治参与不充分、作为千家万户“主心骨”的家庭撕裂和传承断裂等突出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不稳定、城镇化不稳定和农业现代化不稳定的潜在风险,成为制约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的重要因素。

五、构建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格局的思考和建议

1. 将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置于新时代的宏观背景下统筹考虑,避免单极化倾向

从国际国内发达地区的经验和发展理论出发,只有城市发展好,乡村才能真正振兴。四川省人多地少的基本省情和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现实阶段,决定了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下,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将在空间上和体系上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部门持续流动的总趋势不会改变,城市是集聚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公共服务的主要空间,只有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才能将土地流转集中到职业农民手中,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以家庭经营为主、多种经营主体并存的农业生产格局将长期存在,但不同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家庭经营将向以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业经营现代化转变,这将成为部分种田能手和“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广阔空间,对部分城乡劳动力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因此,以事实为依据,尊重发展规律,对劳动力流动和转移长期性和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要对离土离乡的劳动力采取以农业提质增效为目标的引导,以自愿选择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为主要对象,防止以过度行政化手段推动其返乡,包括行政干预土地集中、给予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等超常规待遇,避免政府资源浪费的同时不侵害小农利益。另一方面,要加大城市建设力度,特别是提高小城镇居住品质,由城市引领乡村,让返乡农民工能够在专心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享受便利的城市公共服务。

2. 形成提质和增收为导向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局面,培育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的主力军和后备军

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的核心在于质量效益的提升,要使城乡劳动力实现稳定的接力发展,持续增收、实现家庭富裕是其中内在的必然要求。在老一代农民工退出、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力的代际转换加速期,部分即将或已经退出城市就业市场的4050农民工,对农业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具有农业经营的基本技能,具备成为乡村发展接力劳动力的条件。建议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等重大战略为契机,将这部分群体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加大政策支持,将其培育为农村产业发展的主力军。一是摸清家底,建立返乡农民工资源储备库,了解这部分群体的规模、发展思路 and 目的、所具备的基本条件等。二是以村镇为基本单元,建立共享式的全省农业产业发展数据平台,包括地方产业基本情况、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等。三是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向全体农民工提供可能的政策支持介绍。四是返乡农民工提供针对项目的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等综合性技术支持,而不是简单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避免项目投入的盲目性。与此同时,应加大对具有资金、组织管理甚至技术和资源优势,且希望在农业领域有所发展的城市人员的引导和支持,关注具有巨大潜力的、掌握现代信息手段和工具的“新农人”,将这二者培育成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的后备军。

3. 建设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格局,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就城乡劳动力接力发展而言,其重点在于通过深化要素体制改革,推进城乡要素深度融合。一是切实践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赋予进城农民工完整市民权。二是深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盘活要素、提高配置效率为核心进行创新,探索建立农民工的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农房,以及其他资源产权的自主有偿退出或市场交易制度。三是重点关注创业、待业和养老三类不同的农民工返乡群体,因地制宜地分类探索建立有针对性的扶持或保障政策。四是探索建立发现和回引返乡能人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特别是应注重培育或重用一批返乡“能人”成为新型农村管理人才,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集体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 (1) 谢桂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04).
- (2) Murphy, Rachel. Return Migrant Entrepreneurs and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Two Counties in South Jiangxi,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9, (04).
- (3) Stark, Oded. On the Microeconomics of Return Migration [A]. Trade and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Jagdish Bhawati [C]. Basingtoke: Macmillan, 1996.
- (4) Yaohui Zhao.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
- (5) 张亮, 李亚军. 就近就业、带动脱贫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环境[J]. 改革, 2017, (06).
- (6) 庄晋财, 芮正云, 曾纪芬. 对农民工创业能力的影响——基于赣、皖、苏 183 个农民工创业样本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4, (03).
- (7) Cai Fang. Population dividend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1978-2018 [J].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8, (03).
- (8) 陈方, 张海鹏, 朱 钢. 当前中国农民工返乡的特点、问题与政策建议[A]. 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6~2017) [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9)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 四川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专题调研报告[A]. 四川城镇化发展报告(2018) [C].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8.